

《藏文白话报》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李荟芹,王习之

(西藏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1913年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创办的《藏文白话报》在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藏文白话报》向西藏各族人民传播国家意识、民族平等团结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提出了变革西藏政治制度、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字)、促进西藏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等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藏文白话报》对西藏各族人民进行了思想启蒙,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重塑。但《藏文白话报》所宣扬的“五族共和”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对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塑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才真正成为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藏文白话报》;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9.016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民国初年,国基未稳、边疆失序、内忧外患严重。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为根本目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塑迫在眉睫。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新生的民国政权亟须宣扬自己的建国理念和主张,因此掀起了新一轮办报的高潮,《藏文白话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截至目前,学术界对《藏文白话报》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少,且大部分是从新闻史的角度阐释中华民国的对藏政策。刘新利、蔡秀清在《近代中国

民族国家构建视域下的《藏文白话报》》一文中阐释了该报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作出的贡献。^{〔1〕}笔者认为,《藏文白话报》作为民国对藏政策的发布平台,起到了增进内地与西藏相互了解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藏文白话报》在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当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之际,《藏文白话报》用通俗的语言向西藏各族人民传播国家意识、民族平等团结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密切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

作者简介:李荟芹,法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王习之,西藏民族大学2021届文学硕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本文系西藏教育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西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xajykt121004)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族之间的联系,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重塑。

一、《藏文白话报》的创办正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际

《藏文白话报》的创办正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际。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屡屡侵略中国,清政府屡战屡败。民族危亡的残酷现实迫使当时开明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出路,实现初步的群体觉醒。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梁启超认为“现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3]“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4]他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通过建设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新的国家层面的民族认同”。^[5]1904年,孙中山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最强音。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要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仅意味着中国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从狭隘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为代表中国各个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重塑也随之产生。

从国际环境看,《藏文白话报》创刊时期,西藏危机重重。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策划了一系列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动。英军在1888年和1903年两次发动对藏战争,不断拉拢西藏上层贵族,煽动“西藏独立”。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寻求清政府帮助无果,遂向英人示好。1910年2月,清政府派钟颖的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2月25日,清政府革除达赖喇嘛名号。清政府的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和措

施,毁灭了十三世达赖想要寻求清中央政府帮助的希望,反倒促使英国与中国西藏关系走向密切。中华民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国际环境并未好转。1913年召开的中、英、藏“西姆拉会议”就是一场英帝国主义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在英国的要求下,十三世达赖派噶伦夏扎为全权代表参加会议,并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和十三世达赖都拒绝在协约上签字,“西姆拉条约”无效,但实际上依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从国内情况来看,《藏文白话报》创办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处于失序状态。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驻藏川军叛乱,法纪荡然无存,十三世达赖发布文书,将驻藏大臣人员、官兵一律缴械遣送出藏,但西藏仍愿意给中央出乌拉。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的称号。^[6]这表明中华民国政府努力想改变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据记载,从1912年6月到1913年2月初,中华民国政府委派钟颖等赴藏担任西藏办事长官,先后委派人员不下十位,^[7]但因英人阻挠,鲜有能够入藏者。

在中华民国政府难以对西藏实施有效管辖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统一成为民国政府亟待解决之事,亟须构建相应的管理机构和联系纽带。《藏文白话报》成为向西藏各族人民宣传中华民国建国理念和对藏政策的突破口。由于西藏、蒙古危机重重,1912年7月24日,中华民国成立蒙藏事务局,“隶属国务院,管理蒙藏事务”。^[8]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打击分裂势力,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增强西藏各族人民对中华民国的认同,蒙藏事务局成立后就积极筹办《藏文白话报》。其办刊宗旨就是“祛除共和障碍,端赖融洽感情,实现五族大同,巩固国基,必上下内外信息通达”,^[9]目的就是宣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和中央治藏政策。

1913年元旦,《藏文白话报》创刊,1914年7月停刊,共18期。栏目有图画、法令、论说、要

闻、文牍、专件、小说、问答、杂录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时政性强,尤其以“论说”最为精彩。之所以用白话报,主要因为西藏几乎全民信教,教育也基本被上层贵族把持,下层群众受教育不多,中央政府希望更多的西藏群众能够看懂通俗易懂、浅显简单的白话报,让更多西藏人民群众了解中华民国,增强西藏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密切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二、《藏文白话报》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准则、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主要体现在中华各民族具有政治上追求团结统一意识,经济上交流互补的观念,文化上融合发展的导向,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心理。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主要通过向周边民族输出文化,通过教化的手段实现族群的融合和思想文化的统一。近代中国主要通过民族国家构建,通过国家意识、民族平等团结意识、公民意识等价值观念引导,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发展,逐渐开始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构。《藏文白话报》正是通过向西藏各族人民传播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在客观上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重塑。

(一)《藏文白话报》中体现的国家意识是民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

共同的国家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其本质是对国家的认同。近代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形成于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族侵略的历史中。中华民国初年,内地已经实行共和,西藏仍维持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多数民众对国家主权、总统、政府等基本不了解,“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中央政府迫切需要使民众转变皇帝皇权等观念,在各族人民中树立共和制度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藏文白话报》的主要任务就是向西藏各族人民宣传国家意识,建立西藏各民族对新生政权的认同,从而整合中华

民国境内各民族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

《藏文白话报》中有10余篇自问自答的“五族须知”系列问答,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向西藏各族人民全方位普及国家知识,向西藏各族人民展示了中华民国的组织制度和运作形式,有助于增强西藏各族人民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比如,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藏文白话报》通俗回答:五大族所在的地域就叫作中华,共和国是注重民权的,故称民国。五族地域之内这许多人民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10]此外,对于何为国家、何为主权、何为统治权、何为共和政体、何为大总统、何为内阁、何为总理等问题,《藏文白话报》都进行了简明的回答。同时《藏文白话报》还用大量的篇幅,对中华民国的机构及其职能作了相应界定。比如,外交部、教育部、内务部、交通部、司法部等主管何事?有何职能?立法、行政、司法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检察院?什么是议会、议员?国务院、秘书厅、法制局到底是什么等。另外,《藏文白话报》还通俗地介绍了何为公约,何为国际互换文件,何为国际礼仪,何为国书,此类知识介绍有利于西藏各族人民了解国家意识和国家制度方面的知识,继而产生国家认同。

《藏文白话报》突出国家主权意识。该报发刊词就明确指出要扫除封建余毒,共建民国,“蒙回藏不能离中华民国别自成为蒙回藏,中华民国不能离蒙回藏别自成为中华民国……卫蒙回藏即以卫中华民国,卫中华民国即以卫蒙回藏”。^[11]中华民国是蒙藏回等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其命运休戚与共,各民族都有保护中华民国、捍卫国家主权的义务和责任。面对英国和沙俄的挑衅,《论中国政府为西藏的难兄难弟》明确指出西藏各族人民要团结,“切不可听了外人指使,自己里头先扰乱起来”。^[12]《论宜服从本国之统治权》明确西藏各族人民要服从国家法律,就是服从本国的统治权。“盖国家虽由土地和人民组织而成,其所以维持此土地人而成为一国家者,则赖有此统治权力,故统治权乃国家生命之

所寄也。”^[13]明确西藏各族人民要服从国家法律,就是服从本国的统治权,并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是二十二个行省、内外蒙古、西藏和青海。为增强西藏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论五族人民宜注重国家之观念》强调加强五族团结,增进国家认同,“约法载明,国家以人民为主体……共和国,则主权在人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辈当极力强国,以求永存之道……五族宜结合大团结,以谋巩固其根基。不宜自顾私利,割裂纷争,破坏国家之统一也……愿我五族人民,皆以爱国为第二生命,勿以小害大,以私害公。努力进行,以求政治改良之法”。^[14]《辨惑》中则言辞恳切,阐述了古代历史上汉藏之间的交好,认为五族合为一家,面对帝国主义蛊惑和挑拨,西藏各族人民“万望警醒,外面谣言万不可听”。这些都无一例外向西藏各族人民传递国家主权意识,宣扬捍卫主权、反对分裂人人有责。

《藏文白话报》每期都有“法令”栏目,刊登了临时大总统令、国会选举法,向西藏各族人民普及相关知识,也记载了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当天,孙中山就正式宣告“五族共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对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及其他 22 个行省拥有主权。^[15]由于交通不便,为了使国会成立之日西藏议员能够如期参加,建议在京举办西藏选举。《藏文白话报》中记载了“大总统准其即日在京举办西藏选举”的批文,以及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灵活选举的全过程,最终选出了西藏出席参议院代表 10 名,众议院代表 30 名。西藏作为中华民国大家庭的一员发挥了参政议政的作用。随后,《藏文白话报》第七期刊登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参议院中西藏有 10 个名额,任期为 6 年,众议院西藏有 10 个名额,任期 3 年,明确了西藏在国会的权利和义务,表明中华民国对西藏地方无可置疑的主权。

(二)《藏文白话报》中的民族平等团结意识推动了民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塑

情感隔阂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首先面临和亟

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西藏地处边陲,交通不便,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大多采用“以夷制夷”的方式,西藏地方拥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与中央联系本不够紧密。而且历史上形成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之间并不平等,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一直存在。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由于英帝国主义阻挠,中央政府对西藏不能实施有效管辖,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也极不正常。《藏文白话报》作为宣传平台,主要任务就是向西藏各族人民宣传“五族共和,民族大同,蒙回藏与汉满人人平等,是一个大家庭,要团结一致共建中华民国”,从而整合中华民国境内各族人民对“五族平等、团结”理念的认同。尽管当时的“五族共和”内涵与中华民族的内涵有一定的差距,也不可否认“五族共和”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但不能因此忽视中华民国初期提倡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华民国内部民族之间的关系,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重塑。

《藏文白话报》明确提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理念。《藏文白话报》发刊词中倡导,五族人民要一心尊重国权,要“优待蒙回藏……且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16]该文宣告,蒙回藏离不开满汉,满汉也离不开蒙回藏,且蒙回藏与汉满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边陲歧视,无种族谬说。《藏文白话报》在第一期刊发了清帝退位诏书,阐释了结束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的原因,并就蒙藏的政治权利进行了宣告,其中第一条就是“与汉人平等”。^[17]《论中国政府为西藏的难兄难弟》介绍了历史上的藏汉友好关系,回顾了清中央帮助西藏抵御外辱的事实,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就需要藏族与汉族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成命运共同体,要“齐心合意振起家业,并无上下之分,尔我之别”。^[18]鉴于西藏几乎全民信教,《论佛法足以发挥共和之精神》宣扬平等自由,从佛法的平等推及五族平等团结,“如今五族共和,合成民国,一点没有种族之见,就是平等的好处。

如今五大民族,共享共和之福,扫除层层压制,就是在天堂之上了。”^[19]在《论宜服从本国之统治权》中更是明确提出,在中华民国内,蒙汉为一体,边腹为一家。《辩惑》认为民国主持的道义,与佛法有相通之处。五族为一家兄弟,家盛家败都是一起承担,五族是左右手关系。《中央政府对待满蒙回藏之感情》中再次重申,五族是心腹手足、父子兄弟关系。

《藏文白话报》中的“小说”和“图画”栏目以最浅显的方式向西藏各族人民传递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比如,第一期的《合群思想》,第七期的小说《合力原理》等,通过一些浅显的例子,清晰地说明“盖天下事,独力者难举,合力者易举”。只有各民族之间平等相处,互相体谅,才能实行共和。“愿为蒙藏回人民默体政府励精图治之心,实行共和,力求进化,结成五大族巩固之基,中华民国幸甚,我蒙藏回人民幸甚。”^[20]再如第十六期的插图很有寓意,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国各民族的觉醒:在一个危险的地带,兄弟五人同卧一处,五人觉醒的程度不同。长兄害怕其他兄弟有难,急忙振铃以觉其醒。第十七期的插图则更为易懂:图中五人就是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他们关系和睦,一起携手团结起来共创中华民国、共建共和体制,五族人民携手立于地球之上,五色国旗在地球上迎风飘扬。诸如此类的小说和图片还有不少,都宣扬五族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共建中华民国,深刻阐释了“团结是福,分裂是祸”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从《藏文白话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理念,就是西藏的命运与中华民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西藏地方和民国中央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而且《藏文白话报》在宣扬民族平等与共和观念时,言辞恳切,推心置腹,娓娓道来,更像是平等的双方之间的聊天谈话。也正是如此,《藏文白话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中国报》赞扬蒙藏事务局的白话报为开通边地风气、影响边民思想作出了贡献。

(三)《藏文白话报》中提出了民初西藏各族人民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历史上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保障。而各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民族的经济程度以及共同体对个体利益的满足程度。因此,中华民国成立后,如何改良西藏社会政治,如何促进西藏社会发展,如何加强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成为中华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藏文白话报》中对藏政策的主要内容就包括改良西藏政治制度,利用西藏丰富的资源发展西藏社会的生计,开办近代教育,促使西藏各族学习汉文汉语,提倡西藏各族速遣子弟来内地读书等主张,不仅有利于促进西藏的社会发展,更利于加强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民初西藏各族人民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路径。

《藏文白话报》提倡改良西藏政治制度。第十四期的《蒙藏政教平议》提出西藏的政治制度与内地不同,会导致行政不能统一,因此要进行适当的因势利导,让西藏服从中华民国统治,遵守国家法律,实行宗教信仰自由。“要而言之,政府秉国权以保安宁,援国法以维秩序而已。……随人民向所信仰者,因势而利导之……五族一体,应当共同服从于本国政府统治权之下,自无疑义矣。”^[21]同时,该报对蒙藏事务局的沿革进行了阐释。1914年由于蒙藏事务繁多复杂,蒙藏事务局改蒙藏院,直属大总统,显示了中华民国对蒙藏事务的高度重视。

《藏文白话报》中提倡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民国初年,孙中山就倡导五族互通婚姻,“劝汉、满、蒙、回、藏五大族各宜互通婚姻,一以除异同之迹,一以期情谊之孚。”民国政府希望通过五族通婚的方式来联络感情,增加共性,减小差异。《蒙藏社

会亟须改良说》中提出蒙藏社会弊端较多,需要与蒙藏同胞协商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文字改良,注重汉文汉语学习,利于互相之间交流交往交融;二是生计改良,蒙藏地方资源丰富,应与内地互通,发展工商业。“生计若裕,知识易启。”^[22]《说商业关系以告蒙藏及内地之人民》中指出,在“蒙藏僻处边陲,强邻环伺,非亟图振作,无以自立,刻值此大同时代,五族一家,宜多选子弟入学读书,或习工艺、工商业,数年以后,学业有成,可实地练习。”^[23]《论蒙藏宜协力推行以固国基》中则强调蒙藏地大物博、物产丰饶,“故我愿蒙藏人民善于农者为农,善于工者为工,善于商者为商”。《论蒙藏生计之前途》中指出蒙藏社会发展“必先开垦以培其本,次教育以启其智”,^[24]利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经济发展。

《藏文白话报》中主张发展西藏教育,鼓励学习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提倡西藏各族青年子弟到内地学习,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蒙藏两族人民宜偏习汉文汉语》认为语言是表达情感、灌输知识的器械,语言不通,文字不同,容易产生隔阂,“这语言文字,与五族共和关系,正如饥者需食,寒者需衣,是一刻也不能离脱”;并指出“蒙藏开始进化,自然又要以偏习汉语汉文为要,能汉语便好交际,解汉字便好阅书,藉这两层,透彻了祖国情形,办事自有把鼻,了解共和真理,大家便有爱情”。^[25]可见,当时是把汉语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承载工具,学习汉文汉语,便于交往,能了解国家大势,增进藏汉民族感情,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身份的认同。《论民国教育宗旨以告蒙藏同胞》指出,中华民国乃五族之民所集合者,五族之民应宜注重公德,共爱此国家。则国家之基础愈来愈固,人民之幸福无穷。人民谋生计,实利主义要以道德为根本。民须有国家观念,团结思想,一支箭容易折断,许多箭就不易折断。^[26]《论蒙回藏宜速遣子弟来内地读书》则倡导蒙回藏青年来内地学习,不仅可以学到先进的知识技能,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了蒙回藏青年与内

地青年的交往交流,增强了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7]

三、对《藏文白话报》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评价

古代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是“大一统”思想。在民国初年,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涵。《藏文白话报》中体现的国家意识、民族平等团结等观念,客观上重构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西藏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藏文白话报》宣扬的“五族共和”思想是有一定消极影响的,因此需要对《藏文白话报》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客观评价。

(一)《藏文白话报》中的国家意识等客观上重塑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

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就是引导各族人民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藏文白话报》向西藏各族人民传播国家意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意识,其主要目的就是宣传中国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也就是中国人民从“臣民”向“国民”的身份变迁,试图通过报纸的宣传作用逐渐塑造各民族人民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形成各族人民“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同时,该报主张社会改革,鼓励学习通用语言文字,提倡青年学子到内地学习,有利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密切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西藏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五族共和”并未实现真正的平等,五族也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多民族国家这一现实,但是《藏文白话报》对国家意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观念的宣传,凝聚和传播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标志性符号(国家意识、民族平等团结意识等),规定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主要意涵和发展方向,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有利于激发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对抵御外来侵略和反分裂斗争具有积极意义,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

在中华民国成立前,中华民族还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一词也刚刚出现,对于自身的民族构成,也就是“我是谁”的问题,尚不清楚。“中华民族”这个词的内涵仍在发展之中,“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的内涵在民初也有一定重合。如梁启超将中华民族定位为一种超越中国各民族“小民族主义”的更高层次的“大民族主义”,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一个大家庭”,通过建设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新的国家层面的“大民族”认同,以回应西方冲击,救亡图强。^[28]中华民国建立后,开启了近代中华民族百年认同的历程。《藏文白话报》的宣传,增加了西藏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这个集体身份的认同,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身份认同可以看作是个体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身份认同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关系存在感和归属感的确认。”^[29]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就意味着同时对由此身份带来的权利和义务的确认。汉满蒙藏回认同自己的中华民族这个“集体身份”,就有义务和责任捍卫中华民国的安全。

(二)《藏文白话报》中的“五族共和”思想,对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袁世凯窃国后,孙中山开始更深入认识中国多民族的状况:“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30]他明确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客观上讲,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军阀专制,国内民族平等未能实现,民族分裂严重。针对这种形势,孙中山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

史实际出发,发展了“中华民族”概念,明确主张“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中华民族”。此时中华民族的概念与之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内涵已经有所不同,孙中山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内涵。之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研究阐释不断拓展。1935年,历史学家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自从秦汉之盛时算起到现在二千多年,已经‘合为一家’……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31]此时,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统称。“中华民族”作为核心概念与标志性符号得到初步传播与认同,民族复兴意识也随之增强。

《藏文白话报》提倡“五族共和”“五族大同”,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一词内涵在民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对封建民族压迫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在民初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加深,西藏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但中华民族并非只包括“五族”,“五族”之外的其他弱小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因为“五族共和”思想存在忽视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缺陷,虽然孙中山也很快改变了“五族共和”的提法,但“五族共和”的消极影响一直存在。强化“五族”的民族意识,忽视其他弱小民族的存在和平等地位,这种观念对民族关系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甚至到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干脆不承认少数民族,只讲中华民族、国族。这些对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对民族关系的改善都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所以,虽然《藏文白话报》提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但由于《藏文白话报》办报时间较短,影响的群体和范围都很有有限,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观念并未真正深入人心。在中华民国政府执行民族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民族压迫,仍然存在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思想倾向,对藏汉民族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甚至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藏汉隔阂仍然十分严重。

总之,《藏文白话报》的创办正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际,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重塑。随着“中华民族”一词的内涵逐渐廓清,“五族共和”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而且在实际执政中,中华民国并未真正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也未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共和,这些对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塑有一定消极作用。但总体上《藏文白话报》体现了藏、蒙、汉各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西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才真正团结了中国的少数民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释:

- [1]刘新利、蔡秀清:《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域下的〈藏文白话报〉》,《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 [3]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年),《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第4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
- [4]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7页。
- [5][28]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

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第1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6、76页。

[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354页。

[7]朱丽双:《在真实与想象之间:民国政府的西藏特使们(1912-1949)》,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8][9][10][11][12][16][17][18][19][23][25][26]《藏文白话报》,徐丽华、李德龙编:《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22、115、8、73、8、84、73、84、754、619、427-432页。

[13][14][20][22][27]《藏文白话报》,徐丽华、李德龙编:《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7、400、128、809、607页。

[15]《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一号》,《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

[21]《藏文白话报》,徐丽华、李德龙编:《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81页。

[24]《藏文白话报》,徐丽华、李德龙编:《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9页。

[29]董慧、王晓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现实挑战及铸牢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30]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1年1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4页。

[31]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体的》,《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15日。

[责任编辑:刘姝媛]